新书评介

皇权传承研究的新进展
——读《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徐艺圃

杨珍新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已由学苑出版社于2001 年 11 月出版。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以下简称《制度》)一书颇具理论水平和思想深度，研究视角较为新颖，并有不少新的认识和见解。全书虽然长达48 万字，但因内容丰富，多有新意，条理清晰，文字简洁明快，所以有着一定的可读性。这是作者积将近二十年之功力，进行一系列专题研究后，所撰写的一部相当厚重、严谨而又别具一格的史学专著。

现分五个方面，对该书做一简述。

一、关于皇权与储权的阐释

《制度》对于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研究，是围绕皇位继承的实质是皇权传承这一论点而展开。该书指出，皇帝由于治理国政和传承皇权，即行权与传权的需要，不得不将部分权力赋予丞相与储君，相权与储权由此而生。相权与储权同皇权的互动关系，是决定皇权的发展阶段以及皇权集中、强化程度的重要因素。显然，该书是将皇权与储权的矛盾，放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相等同的地位，予以考察，认为上述两对矛盾对皇权的各个方面，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作者还提出了皇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本质，使其具有不断集中、强化权力，达于极致后，迅即消亡的内在发展逻辑等观点。

作者对储权作出新的阐释：储权是皇帝对于储君未来所拥有的皇权的部分预支，即皇帝将其本人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的一部分，提前交付储君。同时，《制度》还提出、论述了储权对皇权的反作用，储位与储权的分离，清朝储权从无到有又到无的演变，储权的有无与皇权集中、强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清朝选择皇位继承人标准的反复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抓住了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的中心问题是储权这一关键，作者才能对秘密建储制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该书认为，秘密建储制度的实质，是使暗定储君与储权相分离，进而取消储权，解决皇权与储权的矛盾及储位之争，推动皇权的集中与强化。清朝创建的秘密建储制度是对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是古代世界各国王位继承制度中的一个创举。

作者在数年前即已提出明清两朝、明清皇权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制度》一书指出，明太祖朱元璋只是在皇权与相权的权力分配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未触动皇权与储权的关系，并继续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明朝皇权的集中与强化，之所以未能达到朱元璋所预期的效果，皇帝与储君之间的权力分配模式，仍因袭旧制而无任何改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清朝逐步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取消储权，则解决了皇储矛盾和储位

[收稿日期] 2001- 11- 12
[作者简介] 徐艺圃 (19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北京 100101

之争问题。可以说，雍正、乾隆二帝最终取消储权的意义，等同于朱元璋的废除相权。这是明清时期皇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两个重要标志。

明清两朝相继废除相权与储权，是统治集团上层权力分配模式的一次重大变化，皇帝已最大限度地将行使皇权和传承皇权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皇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制度》明确指出，明代内阁与清代军机处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与传承关系：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他本人以及其后明朝诸帝，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与没有相权的皇权相适应的新的中枢辅政体制，而代替丞相制的内阁制度，尚不能完全符合高度集中的皇权运作需要。清代军机处是对明清内阁的进一步改进和发展，它解决了朱元璋废除相权后在中枢辅政机构方面所遗留的问题。

《制度》一书还认为，当皇权的集中、强化达于极致，皇位继承制度出现重大变革之际，皇权的随意性、专断性以及缺乏制度监督与约束的弊端，也发展到顶点。这是隐伏着的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皇权的极度集中、强化与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变化，共同开启了中国封建皇权走向灭亡的最后路程。

二、从满汉文化的冲撞、交流与融合这一视角，考察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

清朝是满族统治者所创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大一统中央王朝，在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冲撞，到逐步融合的漫长过程。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则与这一过程相始终。《制度》从清代满汉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这一新的视角，对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层次内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制度》指出，康熙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满族贵族依然受到传统旧制的较深影响，在其头脑中，汉族宗法制嫡长观念尚未确立，所以对于这一与满族传统观念、习俗相对立的汉制，抱有抵触情绪。虽然不断集中与强化的皇权，在政治层面上，为康熙帝实施这一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持，可是，如果从满族贵族的思想、心理状态看，适宜于这一制度实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康熙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以失败告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一新的认识，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认识清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最终失败的原因，颇有启发。

该书还从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角度，论析清朝不同时期选择皇位继承人的标准问题。指出：清朝最初实行汗位推选制，择贤而立，体现了满族的文化和习俗。康熙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以皇子是否具有嫡长身份，作为唯一标准，这是汉族宗法观念的体现。秘密建储制度建立后，皇帝挑选皇位继承人时，既择贤而立，又优先考虑嫡子，将满汉两种文化相结合，从而使清朝在选择皇位继承人的标准上，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实际上，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遵循满洲旧制，到完全采用汉制，又到兼顾满汉传统，但各有扬弃，并有所创新的过程。

作者认为，秘密建储制度既是满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同时也具有多元文化特色。它不仅保留了满族汗位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吸收了汉族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部分内容，而且对于古代波斯王朝的王位继承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借鉴。

《制度》总结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与历代王朝皇位 (王位) 继承制度迥然不同处，是它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一定的开创性，以及皇位继承形态的多样性，并将此置于清朝满汉文化逐步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下，考察两者的互动关系。这一关于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的概括性论述，有助于人们今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三、对历代清帝皇位传承思想的考察

皇帝的皇位传承思想，是其统治思想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帝的皇位传承思想丰富多彩，具有不少独特之处。

《制度》将历代清帝皇位（汗位）传承思想的产生与演变，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尤为注重不同时期清帝的皇位传承思想所具有的内在联系。作者首先从后金汗权、崇德皇权和入关初期的清朝所处政治环境以及满族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一角度，考察了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帝以及孝庄太后等人的权力传承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轨迹。

其次，在论述康乾时期清朝皇权极度集中、强化这一政治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将康、雍、乾三帝的秘密建储思想作为研究重点，深入考察三帝秘密建储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递进性。作者指出，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分为政策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阶段，是由康、雍、乾三帝所共同完成。康熙帝晚年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对于从西周开始实行的嫡长子皇位（王位）继承制予以改革。这是一个创举，尽管康熙帝本人对此还缺乏自觉的认识。他确立了秘密建储的四项宗旨，这为其后雍、乾二帝所遵循，并有所改进和发展。雍正帝实施秘密建储，但又将实施秘密建储之事，及存放建储密旨的地点，告知全体朝臣，既秘密又公开，藏秘于公开。他的秘密建储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色彩。乾隆帝则以超出康雍二帝的胆识与魄力，将秘密建储定立为制度。同时，他对于历代王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予以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因而是唯一一位敢于公开抨击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古代帝王。不过，乾隆帝还是对宗法制思想作了很大妥协。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有关论述中，有意回避了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标准问题。因此，他所构建的秘密建储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不完整性，这是一个较大缺陷。《制度》通过对康、雍、乾三帝秘密建储思想的考察，清晰地显现出清朝秘密建储制度从创始、逐步改进到最终确立这一完整的发展脉络。

该书还以清朝前期诸帝的皇位传承思想作为参照，对慈禧的权力传承思想，作出较为深刻的阐释。

综上所述，作者并未仅仅停留在对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演变过程的描述上面，而是揭示并剖析了这一演变背后的社会习俗与观念，特别是起有主导作用的清帝权力传承思想。这无疑增加了该书的深度和力度。

《制度》考察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清朝诸帝的皇位继承思想，这在皇帝统治思想研究中，是一个新的探索。

四、将清朝前期史与晚清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制度》所做的另一探索，是将清朝晚期的皇权与皇位继承制度，纳入包括清前期皇权与皇位继承制度在内的总体序列中，予以综合考察，提出若干新的论点。这是将清朝前期史的研究与晚清史的研究进一步结合的一个尝试。

例如，《制度》指出，咸丰帝临终前对其幼龄继承人载淳的辅政班子所作的安排，即八大臣赞襄体制、皇后钮祜禄氏和嗣皇帝载淳分别掌有御赏与同道堂二印，等等，是他总结清初多尔衮摄政与四大臣辅政的经验教训，并依据当时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具体情况，而精心建立的一个相互制约的权力系统。

《制度》在剖析慈禧、奕 等人发动辛酉政变，以垂帘听政体制取代八大臣赞襄体制的诸多原因时指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晚清皇权衰微，皇帝的至高无上威严已大幅度降低。虽然咸丰帝确有遗旨，且为众臣所知，可是，已无法像皇权高度集中、强化的清朝前期那样，当皇帝本人去世后，其遗旨仍然具有使所有臣工（包括后宫成员）无条件执行的威慑力量。因此，慈禧、奕 等人方敢于通过政变，推翻咸丰帝生前的有关决策，最终导致了慈禧的专权。

《制度》论证慈禧的皇权传承思想时，阐述了懿旨确立嗣君与汗位推选制度，尤其是与秘密建储制度之间，具有程度不同的传承关系这一新的观点。作者还指出懿旨确立嗣君的实质，是传承皇位，而不是传承皇权；懿旨确立嗣君模式，并非皇位继承制度，而是用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的一种应急措施；等等。

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主权的

逐渐丧失，亦即清朝皇权的不断被侵夺，清帝制定决策的出发点，除去维护清朝自身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外，还须虑及列强的种种意图，维护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及其特权，清朝皇权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清朝皇权的剧变，预示着历时两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已濒临末日。诸如此类的思考和探索，为晚清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人们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

五、对清朝若干重要史事的新阐述

由于作者是将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嬗变，与清朝皇权的兴衰历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制度》一书涉及到清朝若干重要政治史事。对此，作者在较为全面地掌握有关史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如书中引用作者译校的满文档案 130 余条）的基础上，予以深入分析，作出诸多新的阐释。例如，孝庄在皇太极时期及“继统危机”时期，政治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高和扩大的原因；顺治帝亲政后，与孝庄太后的关系日益恶化的原因和经过，这一事态对于挑选皇位继承人所产生的影响；乾隆初年弘皙一案的来龙去脉；乾隆帝内禅与秘密建储制度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以及内禅加速清朝中衰之势的问题；《垂帘章程》对慈禧的限制与约束作用，慈禧长期专权的原因，等等。

关于清朝皇位继承制度自身演变中的若干重要史事，如康熙朝两废太子时反太子派所起的重要作用；复立太子问题上满汉传统观念的激烈冲突；下五旗王公在康熙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历史渊源；雍正初年，允　对雍正皇位的潜在威胁；嘉道二帝的秘密建储与雍乾二帝秘密建储的不同之处，等等，大都是以往有关研究中尚未触及或研究不足的问题，《制度》也分别作出阐述，读后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总之，全书较好地贯彻了皇位继承制度研究是皇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思路，并将作者关于皇权与储权问题的一系列新的认识与整体思考，体现在对各个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中，环环相扣，形成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局面。可以说，《制度》是一部从皇权传承的角度，研究皇权的史学专著。它的探索与创新，即在于此。

《制度》的主要不足之处，一是在考察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时，缺乏与所论述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即政治活动所源起的社会经济根源相联系。这一缺陷，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作者对清代政治史的总体把握，影响到该书所作结论的全面性。其次，虽然《制度》将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与中国古代其他王朝皇位继承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使这一研究具有开拓性，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与古代西方及东方国家的王位继承制度进行比较，将使我们对于包括清朝在内的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和中国皇权的认识，更为客观和深刻。关于这一不足，作者在该书后记中也已指出。做到上述两点难度很大，但应成为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